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的历史演进、核心特征与基本经验

齐小鹏 陈武元

摘要: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学校国防教育始终与国家安全需求和国家战略导向同频共振,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其历史演进经历了初创奠基、曲折探索、规范重启、全面普及和新时代发展五个阶段。总体来看,新中国学校国防教育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在价值定位上,实现了从侧重服务外部安全的工具理性向彰显育人本质的价值理性的深化;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了从国家指令的垂直贯彻向多元协同创新治理的转型;在教育内容上,实现了从侧重军事技能训练到追求国防文化浸润的升华。中国特色学校国防教育行稳致远,得益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国防法治体系、强化军地协同机制、落实分类施教原则、推进守正创新发展等基本经验。面对新发展格局,需以系统性思维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师资力量薄弱及教学形式单一等现实问题,通过深化课程改革、强化师资建设与构建多元评价体系等举措,推动学校国防教育向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迈进,切实筑牢国家安全的精神防线。

关键词: 学校国防教育; 历史演进; 核心特征; 基本经验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5.016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博弈和全球性挑战相互交织,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安全发展对国民的国防观念和军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①,对于增强青少年学生国防观念、培养国防后备人才、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国防教育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增强青年一代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的核心路径,更是铸造民族脊梁、培育时代新人的铸魂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②的战略要求,并将其置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整体部署之中。“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军事训练在学校国防教育体系中承担着关键的载体角色,而新时代的发展正助推其从单一技能训练向全方位国防文化浸润转型。纵观已有研究,学界对学校国防教育发展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纵向脉络梳理上,厘清了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轨迹;在横向机制探讨上,围绕技术赋能^④、师资建设^⑤、课程改革^⑥等

作者简介: 齐小鹏,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厦门 361005; xmuqxk@xmu.edu.cn);陈武元,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呼伦贝尔学院教授(厦门 361005; chen1315@163.com)。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6页。

③ 习近平:《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党建》2018年第1期。

④ 刘远亮、赵浩仪:《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国防教育的显著优势、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⑤ 叶光华:《铸魂育人视域下高校国防教育多维提质路径探讨》,《中国大学教学》2025年第11期。

⑥ 陈楚瑞、郑晓棉:《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高教探索》2018年第2期。

关键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对历史经验与核心特征的系统性分析仍显不足。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的历程,我国学校国防教育在价值定位、治理模式和教育内容三个层面呈现出鲜明特征,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国防法治体系、强化军地协同机制、落实分类施教原则、推进守正创新发展等基本经验。这些经验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学校国防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在国家战略与制度变迁推动下持续演进,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基于制度与实践的历史梳理,其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初创奠基时期(1949—1957年)、曲折探索时期(1958—1984年)、规范重启时期(1985—2000年)、全面普及时期(2001—2011年)和新时代发展期(2012年至今),整体呈现由初步探索向体系化建设的演进过程。

(一) 初创奠基时期:以战时动员为目标的应急性制度创设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国防教育与国家安全需求紧密结合,主要服务于巩固新生政权与国家国防体系建设目标,呈现出以战时动员为核心的特征。在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青年学生成为国防动员的重要对象,学校国防教育通过宣传动员、集会组织等多种形式广泛展开,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动员为基础的早期实践形态。这一时期学校国防教育尚未形成稳定制度体系,但已在国家安全需求驱动下初步嵌入教育体系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应急性与工具性特征。

制度建构的起点体现在青年动员与军事教育体系的衔接之中。1950年,《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①初步构建了国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下简称“五五兵役法”)的颁布成为关键制度节点,以法律形式对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学生军事训练作出规定^②,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学校国防教育的基本依据。同年,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高校与高级中学应开展军事训练^③,以强化纪律意识并培养预备役军官及技术军官,从而将学校国防教育纳入国家兵役制度与国防建设体系之中。

这一时期,学校国防教育的实践形态在多路径并行中逐步展开。一方面,1954年,“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广泛开展,使体育教育与国防教育形成一定程度的功能融合。另一方面,1955年冬季至1956年秋季,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学生的军事训练先后在全国14所高等学校和127所高级中学(含师范学校)进行试点^④,形成跨学段推进格局。但由于训练目标定位偏重预备役军官培养,严重脱离高校的办学实际。1957年,国家对高校军事训练进行调整,并于同年暂停军训工作^⑤。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学校国防教育在制度层面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初步建构,在功能层面服务国家战时动员需求,在实践层面形成了行政动员与试点探索相结合的运行模式,为后续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曲折探索时期:以政治运动为主导的民兵化训练模式

1958年以后,学校国防教育在政治运动与战备需求的交织影响下进入曲折发展阶段。基于对国际形势与国内国防需求的判断,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⑥,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办民兵师的热潮^⑦。高校普遍成立民兵师或民兵团,学校国防教育逐步嵌入国家政治动员体系。在“大跃进”背景下,军事课程与

① 《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日,第1版。

②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④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65页。

⑤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66页。

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68页。

⑦ 贾化民:《1962·中国民兵》,《中国青年报》2016年5月18日,第6版。

文化课程之间出现结构性冲突,教学秩序受到一定影响。

制度调整在政治运动影响与国防需求变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展开。1959年,中共中央印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大中学校增设军事课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大中学校可以利用课外时间进行一般的民兵训练,暂缓增设军事课程^①。1964年以后,出于战备需要,高校学生“学军当兵”与民兵集训等训练形式进一步展开,强化军事化组织特征,但也同时对学生身心发展与正常教学秩序带来了一定影响。为协调这一矛盾,1966年初,国家出台《关于增进高等学校学生健康,实行劳逸结合的若干规定》,强调教学与训练的统筹安排^②,但同年“文革”爆发使相关制度运行中断,学校国防教育体系脱离规范化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后,学校国防教育在拨乱反正与制度重建进程中逐步恢复与重构。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第11号文件,明确提出将高校学生军事训练纳入教学计划^③,并在条件具备的高校恢复试点工作,标志着学校国防教育从依托民兵体系向纳入教育体系的制度转型。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下简称新兵役法),以国家法律形式明确高等院校学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配备军事教员,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并规定由教育部和国防部共同负责实施,教育部门和军事部门需设立学生军事训练的工作机构或者配备专人^④。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军训工作的重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经历了从政治运动主导、依托民兵组织的非正规化模式,到拨乱反正、重新寻求法律规范的重大转折,学校国防教育的火种得以延续。

(三)规范重启时期:以试点扩面为路径的体系化制度重建

1985年1月,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高等院校、高级中学进行军事训练试点问题的通知》,标志着学校国防教育进入规范重启阶段。同年9月,全国遴选52所高校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同时遴选约102所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协同试点,并依托高校与中学联动机制推进军训实践。此后试点规模逐步扩大,1986年增至69所高校,1987年达105所,1989年扩展至143所,列入试点的高校越来越多^⑤,形成了由点到面的制度扩散路径。

制度规范体系的构建随着试点经验的积累逐步展开。1986年7月26日,原国家教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布《高等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对军事训练内容、学时安排与考核标准进行统一规范^⑥,实现教学体系标准化。在组织保障层面,针对试点初期高校军事教育机构不健全等问题,1986年8月,原国家教委等八部委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军事训练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设立军事教研室并与人民武装部合署办公,共同承担国防教学和学生军训任务^⑦。

基础教育领域的制度延伸与法治化进程同步推进。1997年,原国家教委发布《小学、初中国防教育纲要(修订稿)》,推动学校国防教育由高中和高校向小学和初中延伸,形成了覆盖全学段的分层递进体系。其中,小学以启蒙教育为主,初中以认知教育为核心^⑧。同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以下简称国防法),作为新中国首部国防基本法,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义务^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学校国防教育逐步形成以新兵役法和国防法为核心、教学大纲与部门规章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运行模式由试点探索逐步转向服务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常态化培养,实现由试点扩展向全学段覆盖转型,构建起制度统一、体系完整、标准明确的基本框架^⑩。

①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77页。

② 《中国教育事典:高等教育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255页。

③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133页。

④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143页。

⑤ 汪娜、周仁:《军训:33年间,让青春在淬火中闪光》,《中国国防报》2018年12月10日,第1版。

⑥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168页。

⑦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184页。

⑧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38—342页。

⑨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43页。

⑩ 冯中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施国防教育的历史经验》,《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四)全面普及时期:以专项立法为驱动的标准化全面覆盖

进入21世纪,我国学校国防教育由试点探索逐步转向全面普及。2001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下简称国防教育法),首次以单行法形式确立学校国防教育的法律地位,标志着我国学校国防教育进入法治化普及阶段。该法设立学校国防教育专章,对不同学段作出系统规定:小学与初中阶段强调国防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并结合课外活动实施,高中及以上阶段强调课堂教学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并鼓励开展少年军校等多样化实践活动,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学校国防教育的基本框架与实施路径^①。

专项政策推动下的全国性制度建设持续展开。200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证学生军训的顺利开展^②。同年,教育部、总参谋部等联合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高校实行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训练并行模式^③。2003年又发布了《高级中学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要求高中阶段实施7—14天集中军事训练与军事知识讲座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④。由此,统一规范了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考核标准,从而实现了全国军训标准体系的统一化建设。

制度体系的持续完善推动军训标准逐步统一。2007年,《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发布,对学生军训工作的组织管理、师资建设、安全保障及考核评价作出系统规定^⑤,形成全面普及阶段最为完整的制度规范体系。在上述政策推动下,学校国防教育逐步由高校和高中扩展至基础教育阶段,并与既有制度体系实现衔接运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在制度形态上以国防教育法为核心,逐步形成法律规范与政策体系相结合的制度结构。在功能定位上强化全民国防教育与立德树人协同推进,在实施模式上推动学生军训全国覆盖并向基础教育延伸,最终实现小学、中学与高校全学段贯通,标志着我国学校国防教育完成由试点探索向制度化、标准化全面运行体系的历史性转型。

(五)新时代发展期: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学校国防教育进入质量提升与体系深化的新发展阶段。2013年,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提高学生军事训练质量的通知》,明确以质量提升为核心推进学生军训改革^⑥,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训练内容陈旧及质量不高问题,提出系统性提质增效方向,标志着新时代军训改革进入质量导向阶段。为提高学校军训工作质量,教育部开展了多样化培训项目和示范学校评比活动,推动学校国防教育的特色化发展。

围绕质量提升与体系重构,2017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工作质量监测,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确保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安全有效开展^⑦。同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组织领导体系、教育教学体系、师资队伍体系、承训力量体系与质量监测体系,推动学生军训进入体系化改革阶段,实现制度结构的整体升级^⑧。与此同时,课程体系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教育部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

①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58页。

②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73页。

③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75页。

④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80页。

⑤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2003—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326—1328页。

⑥ 《三部门联合发通知要求全面提高学生军事训练质量》,https://news.12371.cn/2013/10/23/ARTI1382499168876262.s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⑦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工作的通知》,https://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1061/s3289/201705/t20170524_305608.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⑧ 《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https://www.jsit.edu.cn/_local/5/1B/24/9FB3F3850C20E39EB54820E63FA_F2322E5A_1ADE9F.pdf,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强化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并增加实战化内容^①。2021年,教育部等部委又联合印发《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与军事实践有机结合^②。

2021年,《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把国防教育内容融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推动了中小学国防教育的系统化、科学化和制度化^③。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工作统筹指导^④。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进一步细化学校国防教育课程与组织实施要求^⑤,强化党的领导与国家战略导向,标志着学校国防教育制度体系进一步法治化。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制度建设持续向体系化与法治化方向推进,战略定位由服务全民国防体系进一步拓展至服务总体国家安全体系,教育实践由单一军事训练逐步向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转型。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的核心特征

学校国防教育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结构特征,其发展过程由国家安全需求与教育制度变迁共同塑造。从价值定位、治理模式与教育内容三个维度看,其演进表现为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深化,从垂直主导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型,从以军事技能训练为主向国防文化浸润拓展。

(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学校国防教育价值定位的重构

学校国防教育的发展始终面临国家安全需求与教育育人使命的双重要求,既承担着服务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任务,又肩负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责任。从强调服务国家安全的工具属性,到逐步强化育人价值,再到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安全教育与价值塑造的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体现了学校国防教育价值定位的不断重构。

1. 初创期的“安全优先逻辑”。新中国成立之初,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新生政权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面临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学校国防教育高度服从国家安全需求,充满浓厚的战时动员色彩。无论是抗美援朝背景下动员学生参军报国,还是“五五兵役法”明确高校学生军训具有培养预备役军官的指向,都体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将学生视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后备力量。20世纪60年代大办民兵师,高校学生军训逐渐变为民兵训练^⑥,成为大规模培养国家保卫者的重要途径。这一阶段,学校国防教育的育人价值让位于安全需求,呈现出“安全优先逻辑”的阶段特征。

2. 转型期的“育人功能觉醒”。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为学校国防教育的功能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1984年新兵役法和1985年军训试点的启动,标志着学校国防教育体系建设从战时动员转向平时建设。尽管相关政策的表述中依旧提及培养预备役人员的目标,但是也开始出现“养成纪律观念”“锻炼意志品质”等关乎学生个体发展的要求。1997年国防法明确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⑦。同年发布的《小学、初中国防教育纲要》更是将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作为学校国防教育的目的^⑧。这一阶段,学校国防教育开始被视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育人功能开始觉醒。

①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1061/s3289/201902/t20190201_368799.html, 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②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1061/s3289/202104/t20210412_525906.html, 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③ 《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http://www.jgs.gov.cn/uploadfile/3/Attachment/f45f264298.pdf>, 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④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9/01/content_5707818.htm, 访问日期:2026年6月22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人民日报》2024年9月18日,第13版。

⑥ 陈晴:《中国学校军训百余年的发展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

⑦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43页。

⑧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39页。

3. 新时代的“安全育人融合”。进入新时代,学校国防教育的价值定位实现了质的提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学校国防教育的核心使命从储备后备力量转向国防铸魂育人,从特殊背景时期的专项工程深化为学生综合发展的关键要素。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导向,学校国防教育的驱动力逐渐从外部规约转为内在生成,通过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课程教材、纳入评价体系,国家安全的宏观战略与学生素质的微观发展实现了制度化的融合。新时代学校国防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国家安全的捍卫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至此,安全需求与育人功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

(二)从垂直贯彻到协同创新:学校国防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型

学校国防教育兼具国家战略属性与教育实践属性,其组织实施既需要统一部署,也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和学校的现实条件。从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动员,到改革开放后的试点推广,再到新时代背景下的特色培育与协同推进,这一过程体现了学校国防教育治理模式的持续转型。

1. 计划体制下的垂直贯彻。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意志的贯彻大多采用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形式。从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动员,到大办民兵师的热潮,再到20世纪60年代战备需求下的军训安排,均体现出鲜明的垂直贯彻特征,即中央决策,层层传达,各地执行。这种垂直贯彻模式的优势在于响应速度快、动员能力强,短时间内能够取得预期目标。但其弊端同样明显,容易导致脱离地方实际,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等问题。1957年军训工作暂停和1966年因“文革”导致的制度中断,都暴露出计划体制下垂直贯彻模式的脆弱性。但是,正是在此阶段,教育部门和军队系统协同开展学校国防教育的“军地共管”体制也形成雏形。

2. 改革开放中的试点推广。1985年开始的学生军训试点,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扩散路径。以试点为基础,学校国防教育开始了渐进式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确立改革目标框架,选取有条件的地方作为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最终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安排。1985—2000年,学生军训工作从试点到覆盖所有省份的渐进过程,正是制度扩散路径的具体体现。此外,在试点推广模式下,针对实践过程中发现的组织保障不足等问题,也促进了高校军事教研室和人民武装部“合署办公”模式的生成。这种试点推广模式,体现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智慧。

3. 强国战略下的特色培育。随着学校国防教育的普及,如何在保证贯彻落实国家统一标准的同时激发地方活力,成为完善学校国防教育体系的核心议题。一方面,2013年以后,《关于全面提高学生军事训练质量的通知》《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等文件的制定,标志着制度层面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等多样化形式,鼓励地方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探索特色化路径。这种特色发展模式,既能保证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又能尊重地方差异,实现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三)从技能训练到文化浸润:学校国防教育内容的内涵升华

学校国防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展开,反映了教育内容、实施方式与育人目标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技能本位,到改革开放后逐步重视国防观念培育,再到新时代背景下走向文化浸润,这一过程体现了对学校国防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1. 技能本位的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由于缺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当时的国防教育模式深受苏联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技能本位特征。“五五兵役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在学校内受军事训练,并且准备取得预备役尉官军衔和准备担任尉官职务^①。在这一导向下,国防教育内容聚焦队列、战术、兵器等硬性技能训练。这一取向符合当时国防建设的时代需要,是应对外部军事威胁的迫切需求。但是,技能本位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技能训练对场地设备的要求较高,难以大规模开展。这种局限说明,单一技能训练模式在目标定位、资源条件和教育规律之间存在张力,难以长期适应学校教育的实际需要。

^①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26页。

2. 观念导向的转变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战争形态从传统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演进,单纯军事技能训练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这一时代背景催生学校国防教育的变革。1997年《小学、初中国防教育纲要》明确提出,小学阶段以启蒙为核心,初中阶段以认知为核心,总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增强社会责任感^①。政策文本中出现培养国防观念等表述,体现了对学生个体发展和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视。这种观念导向的转变,推动了学校国防教育从“重技能、轻观念”向“重观念、强素养”的转型,国防观念培养逐渐成为学校国防教育的核心导向。

3. 文化浸润的升华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国防教育实现了从课程到文化的升华。国防教育超越单纯的课程和训练,成为一种文化存在,逐渐融入学生个体发展过程之中。在教育目标层面,从知识技能掌握转向核心素养生成。2024年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小学生具备一定的国防意识、初中生掌握初步的国防知识和技能、高中生和高校学生分别具有基本和较强的国防观念^②。在教育路径层面,从实施单列课程转向全面融入育人体系。学校国防教育不再拘泥于军训和军事理论课,而是融入校园文化、社团活动等全方位育人场域。在教学方法层面,从单向知识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借助现代技术打造虚拟场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③。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的基本经验

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学校国防教育逐步凝练出具有稳定性与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体现其制度运行逻辑与发展规律。其核心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国防法治体系、强化军地协同机制、落实分类施教原则以及推进守正创新发展五个方面。这些经验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学校国防教育体系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

学校国防教育的核心使命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④,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首要经验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特色学校国防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确保学校国防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根本保证。

从历史发展看,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学校国防教育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国防教育纳入巩固政权的战略部署,改革开放后引导国防教育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新时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将国防教育明确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领域,学校国防教育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教育发展规律密切联系。党的全面领导为学校国防教育明确了政治定位,确保了学校国防教育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偏离为党育人的初心使命,有效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使国防教育成为弘扬爱国主义、凝聚青年共识、厚植家国情怀、强化责任使命的重要载体。

从实践维度看,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了学校国防教育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的统一。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始终坚持技能训练与军事知识普及的有机统一,既注重国防知识的传授与军事技能的训练,又突出价值引领与品格塑造的作用,逐步推动学校国防教育内容从单纯的技能训练向全面育人拓展。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学校国防教育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积极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 and 革命传统教育^⑤,将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紧密联结,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坚实支撑。

① 《学校国防教育文献汇编:1949—2004年》,第339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6页。

③ 张军霞、马娟娟:《国防科技融入中小学科学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26年第5期。

④ 陈波、杨蕾、吕云震:《新时代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7期。

⑤ 张志勇:《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国防教育的价值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年第14期。

从治理效能看,党的全面领导构建了高效运转与协调统一的学校国防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国防教育体系建设始终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统筹规划、有序前进,有效整合教育系统、军队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校国防教育治理格局。党的全面领导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各方职责分工,推动了学校国防教育体系向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各级各类学校目标一致、标准统一,既保证了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又兼顾了地方实践的区域差异,构建了协同高效的学校国防教育治理体系,为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

(二)健全国防法治体系是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制度保障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学校国防教育作为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程,其有序开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学校国防教育的重要经验在于成功地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和教育发展规律,通过不断地立法和制度建设,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学校国防教育提供了权威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构建起一套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的学校国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该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根基,以国防教育法、新兵役法为核心专门法,明确了国防教育的重要性,为学校国防教育和社会国防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框架。从2001年首部国防教育法的制定,到党的十八大后的修正与修订完善,国防教育法主动适应新时代国家安全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国防教育的战略地位和具体要求。

政策标准体系的细化与修订,为学校国防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标准。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学校国防教育提供了准则,具体的实践行动则需要更为精细化的政策与标准。依据国防教育法、新兵役法,教育部、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等联合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的教学大纲,对军事训练内容、学时、学分、考核标准作出了统一要求。针对中小学阶段的国防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标准,规范了国防教育在中小学课程教材中的内容范围和学科要求。此外,在军事教师、经费保障、安全管理等领域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而实现了从宏观法律到微观标准的贯通。

评估问责机制的形成与执行,为学校国防教育提供了可持续的保障机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律制度的准则。近年来,学校国防教育法律体系日渐完善的重要特征在于逐步建立起常态化的评估与问责机制。《中国国防报》刊文指出,各地开展国防教育要结合实际,制定出台相应的法规,规范有关部门职责任务,明确追责问责办法,同时明确社会对国防教育的监督职能,不定期对国防教育工作进行检查督导^①。这种常态化的评估问责机制,促使各级各类学校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学校国防教育工作的指示,避免国防教育流于形式,保障必要的师资力量和经费投入,确保了学校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军地协同机制是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组织支撑

学校国防教育兼具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的双重属性,其内容的专业性与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单一教育系统难以发挥学校国防教育的最佳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根本性经验:军队以专业前沿的特性深度参与,学校以主动创新的姿态积极承接,构建并深化军地协同育人机制。

军队的深度参与,为学校国防教育提供了专业支撑。军队是国防知识的传播主体,其深度参与为学校国防教育注入了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提供了标准的技能训练。每年由军队选派优秀的官兵承担学生军事技能训练的主要任务,通过严格的队列和战术训练,将基本的军事技能传授给青年学生。二是带来了前沿的认知资源。军队系统掌握着大量的真实国防教育资源,通过安排一系列军事主题教学活动,学生能够突破书本的局限,近距离感知国防建设成就,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三是注入了充沛的精神养分。军队的参与将国防建设过程中的红色基因引入校园文化,

^① 张曼:《全面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中国国防报》2024年9月23日,第3版。

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了充分养分,发挥着价值引领的作用。

学校的积极承接,确保了学校国防教育的实施效果。学校的积极配合与创造性的实践,是将军事资源有效转化为学生素养的核心环节。学校的承接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施精准化的对接。学校基于军事课程标准与学生认知规律,与军队共同策划军事训练方案,确保了军事资源能够精准适配教育目标。其二,构建常态化的教学体系。学校将阶段性的军事训练转化为持续性的培育过程,着力推动国防教育的常态化,在课程建设中推动国防知识融入课程思政。其三,扮演转化者的角色。学校教师和管理者积极引导学生反思军事训练、讨论英雄事迹、思考安全议题,推动学生将外在的纪律约束内化为具有家国情怀和法治观念的精神品格。

军地的协同治理,奠定了学校国防教育的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学校国防教育形成了特色的军地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了规范和权威的制度化治理体系。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法律法规明确了军队支持和学校参与的法定职责,从战略层面上确定了军地协同的基本准则。在组织模式建设层面,高校广泛成立军事教研室与人民武装部合署办公的体制^①,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在组织层面的有效对接,解决了跨部门协作的现实难题。在工作流程机制层面,训练任务制定、教官人员安排、安全保障责任等一系列规范化的环节,确保了学校国防教育开展的有序性和可靠性。

(四)落实分类施教原则是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科学路径

教育的有效性建立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学校国防教育面对的是心智与身体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青少年群体,因此,学校国防教育的实践路径要紧密结合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和情感接受特点,结合不同年龄层学生群体的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措施,构建分层递进的实施体系。

遵循学生发展规律是学校国防教育的核心前提。青少年群体的成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年龄、不同学段的学生,其认知水平、价值追求和情感接受存在显著差异,这就要求学校国防教育必须尊重学生发展和认知规律。小学生对抽象的国防理论难以理解,以具象思维为主,更倾向于接受趣味化的知识传递;初中生认知能力逐步提升,能够形成初步的价值判断,可以系统学习基础的国防知识;高中生的价值观初步形成,具备逻辑思考能力,能够接受适当的军事训练;大学阶段学生的抽象思维趋于成熟,能够对国家安全和国防教育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探讨。我国学校国防教育体系正是在尊重这种差异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

分层递进的实践体系是学校国防教育的落地举措。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学校国防教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从最初的军事训练只限于高中和大学阶段,逐步发展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分层递进实践体系。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符合教育规律的实践措施。小学阶段以国防知识启蒙为核心,采用趣味化的形式播撒国防教育的种子;初中阶段以国防知识普及为核心,系统开展国防安全相关的基础知识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国防安全的重要性;高中阶段以军事技能训练为核心,结合国防安全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国防责任担当;大学阶段以国防理论和战略思维为核心,引导学生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意蕴,培养战略思维。

循序渐进的育人模式是学校国防教育取得显著成效的保障。分层递进的科学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国防教育各学段教育内容脱节、形式单一等难题,构建了具有显著育人成效的循序渐进的育人模式。从小学阶段的国防意识萌芽,到初中阶段的国防观念形成,到高中阶段的军事技能训练,再到大学阶段的国防素养升华,学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接受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国防教育,实现了认知、情感、行动的全链条培育。这种循序渐进的育人模式避免了因教育内容过难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也避免了因内容过浅导致教学流于形式,让学校国防教育真正融入了学生成长的全过程。七十多年来,正是坚持这一科学路径,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五)推进守正创新发展是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活力源泉

学校国防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既能坚守本质又能与时俱进。推进守正创新是学校国防教育的活力

^① 范双利、冯皓:《新时期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机构设置探究》,《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年第6期。

源泉。守正是根基,创新是引擎,只有将创新与守正结合起来,才能够确保学校国防教育始终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防教育领域的真实写照。

坚守国防教育使命是学校国防教育的根本底色。学校国防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着服务国家安全、增强国防意识、培育爱国精神的重要使命,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命英雄主义为重要内容的国防精神作为国防教育的思想引领。守正,体现在坚持践行已被实践证明的基本制度和优良传统,为各项创新探索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七十多年来,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如何改善,我国学校国防教育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始终坚守国防教育的价值底线,确保了学校国防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迷失方向,这也是学校国防教育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关键所在。

创新教育内容和形式是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创新是学校国防教育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适应时代发展、契合学生特点的必然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战争形态加速转变,青少年学生的认知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传统以课堂讲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育模式难以适应当前时代背景下的需求,逐渐暴露出内容单一、形式固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学校国防教育不断推动内容和方法创新,将前沿性的国防科技成果有效融入学校日常教育教学之中,通过创新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国防教育的吸引力。这种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使学校国防教育从特定课程逐渐深入融入校园日常生活,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守正创新、协同统一是学校国防教育行稳致远的长远保障。真正的活力源泉,不是守正与创新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守正为创新奠定基础,确保学校国防教育始终围绕铸魂育人的目标不动摇。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使教育内容和实践方式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七十多年来,学校国防教育不断完善国家统一标准、提升国防教育质量,同时又鼓励地方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特色化活动,通过国防教育特色学校评选等活动激发基层的创新活力。正是在这种坚守本质和创新发展的动态调整中^①,我国学校国防教育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塑造力,为服务国家安全建设、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长远保障。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学校国防教育经历了从初创奠基到体系完善、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校国防教育体系。然而,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当前学校国防教育仍存在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专职师资不足、教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不够、区域和学段发展不均衡、制度执行与质量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制约其高质量发展。学校国防教育正处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需要以系统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在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新时代学校国防教育的发展,需要构建一个“以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教学方法为驱动、以教师队伍为关键、以军地协同为支撑、以多元评价为导向”的发展体系。加强课程内容建设,确保教育内容紧贴国防安全前沿与青少年认知需求;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利用现代化技术增强国防教育的吸引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学校国防教育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强化军地协同育人,发挥军队系统与教育系统的各自优势进而形成合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以科学评估推动国防教育目标的落实。唯有统筹推进、持续发力,才能让学校国防教育真正成为筑牢国家安全防线的坚强阵地。

^① 王昌国、张友新、王舒玉:《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创新发展》,《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Historical Evolution,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Experiences of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i Xiaokun¹ Chen Wuyuan^{2,3}

(1.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P. R. China;

2.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P. R. China;

3. Hulunbuir University, Hulunbuir 021008, P. R.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has always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the nation's security needs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s, exhibiting distinct phas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article divide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to five stages: initial establishment and foundation, tortuous explor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restart,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initial establishment to gradual refinement.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value orientation, governance model, and educational content—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s formed during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has a clear logical progression of stages. In the initial stage,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mainly served national security mobiliz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serve forces, presenting a distinct wartime mobilization feature; in the tortuous exploration stag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war-preparedness needs,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fluctuations and adjustments, presenting a state of coexistence of military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in the standardized restart stage, drawing on the Military Service Law and related policies, it gradually achieved pilot expans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norms; in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stage, dedicated legislation and unified deployment gave rise to a standardized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vering all educational stages; in the new-era development stage, greater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system optimizati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o an int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In terms of core characteristics,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has evolv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ts value orientation has deepened from an early emphasis on the instrumental function of 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toward a balanced consideration of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Second, its governance model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vertical, administratively driven mode of management to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advancement. Third, its educational content has expanded from a primary focus on military skills training 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covering national defense knowledge, military training, and national defense culture. In terms of fundamental lessons,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five aspects: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ing military-civilian coordination,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nd advancing integrity-based innovation. Together, these lessons underpin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a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ystem. Overall,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has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exploratory phase into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sta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undergoing continuous adjustment and refinement across successive historical periods and gradually forming a developmental path with distinctivel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chool-bas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Core characteristics; Key experiences

[责任编辑:丁培卫 孔令奇]